

国学

【国学脉络丛书】

谢路军◎主编

中国
道教
脉络

王卉





中国
道教
脉络

王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道教脉络 / 王卉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6

ISBN 978 - 7 - 5047 - 4531 - 6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道教史—中国 IV. ①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9046 号

策划编辑 初景波
责任编辑 白 昕 白 柑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梁 凡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原中国物资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 - 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4531 - 6/B · 0351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2.25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编者按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对于图书行业而言，我们面临的境况仿佛恰好可以印证狄更斯的这段前后矛盾却又并行不悖的话，一方面是图书出版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是阅读耐心的大幅下滑。现在的读者朋友们既急于了解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阅读学术专著和经典古籍。怎样才能够避免各种因臆说、戏说造成的流俗谬见，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给读者朋友提供传统文化的某种真精神？怎样才能够避免高头讲章、枯涩说教带来的空洞感、困倦感，以尽量自然和灵动的笔法来书写，使读者能够在兴味盎然的阅读中获得传统文化的真知识？这是对图书策划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

解决这一问题，一要靠好的立意，二要靠好的作者。我们在策划这套国学通识读本的时候，就确定了“通俗而不媚俗，生动而不歪曲”的原则。通俗生动是我们全力追求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过度，走向为了好看好懂、为了献媚邀宠于读者而不惜胡言乱语的极端。文化有其严肃的内容，我们不能回避或者抹杀。我们经常将国学经典称作“圣贤书”，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一定是在知识、智慧、道德、境界等某些方面比我们一般大众要高出一点儿的，否则他们就不是圣贤，我们也没有阅读这些的必要了。为

了获得高出的那一点儿，读者朋友需要有基本的阅读耐心和理解新知识的兴趣。有些所谓学术明星的畅销书，给读者挠痒痒，让读者看书有一种“原来圣贤与我想的一样”“真是正中下怀”之感，可是如果真的已经水平一致了，我们还读它干什么呢？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好读易懂牺牲真实的历史和原汁原味的思想文化，必须在兼顾两者的原则下寻找最佳的表达。这个原则的真正落实，需要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作者群。我想起了我的一位老师——谢路军教授，这个为了从事学术研究而放弃了原学校分配的房子、住进了哲学系资料室的老师。谢老师是山东鱼台人，典型的儒家气质，骨子里带着一种真诚、谦和与厚道；读书时专攻佛教，先后师从楼宇烈、方立天两位先生，得名家亲炙；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后，又在牟钟鉴先生的鼓励下研究起了道家、道教，成果颇丰，还写了一本卖得很好的《中国道教源流》。现在，谢老师在学校和其他很多地方讲授“儒释道三教关系”，反响热烈，应邀不暇——还有比这更合适的作者吗？

于是，在编者的盛邀之下，谢路军教授担任了这套丛书的主编，并亲自撰写其中的一本。其他作者也都是谢老师组织、联络的，他们都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年轻博士和讲师，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具着眼时代的新意。谢老师以“脉络”为本套丛书命名，脉络就是来龙去脉，是提纲挈领，是点线成面。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关于国学的通俗的简史、扼要的说明书和生动的简笔画，成为读者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入门佳作。

编 者
2013年青年节

目 录

第一章 道教的孕育与诞生——先秦两汉	1
一、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	1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神仙之说和方士方术	10
三、秦汉思潮的影响	20
四、老子神化的传说	27
第二章 道教的兴起——东汉末年	42
一、魏伯阳与《周易参同契》	42
二、三茅真君	44
三、张角与太平道	45
四、三张与五斗米道	47
第三章 道教的转型——魏晋南北朝	51
一、太极左仙公葛玄	51
二、葛洪与葛氏道	58

三、魏华存与上清派	60
四、山中宰相陶弘景	62
五、寇谦之改造五斗米道	64
六、陆修静与灵宝派	66
七、楼观道	67
第四章 道教的鼎盛——隋唐五代	69
一、帝王与道教	69
二、学者与道教	82
三、民众与道教	93
第五章 道教的发展和变革——宋金元时期	107
一、北宋皇帝与道教	107
二、两宋内丹道派	110
三、王重阳与全真道	113
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	117
五、真大道教	119
六、宋元旧符箓派	121
七、新符箓道派	124
第六章 道教的衰落——明清时期	127
一、张三丰与武当道派	127
二、陆西星与东派内丹学	128
三、明清正一道的兴衰	130
四、明清全真道的兴衰	132

目
录

第七章 道教宫观	135
一、洞天福地	135
二、道教名山	139
三、著名宫观	152
第八章 道教的道术与仪规.....	158
一、道教的道术	158
二、道教的斋醮科仪	163
三、道教的清规戒律	166
四、道士的称谓与修持	168
五、道教的主要节日	171
六、道教的各种神仙	173
后记	186

第一章

道教的孕育与诞生——先秦两汉

一、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

人类初期，也就是在原始社会阶段，古人对一些自然现象包括人类生产活动和情感意识活动的变化，由于认识水平以及实践的局限，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便把日月星辰、海河山川和祖先等视之为神灵，加以祭祀。先民们崇拜自然，其目的是为了祈福免祸，祈求它们保佑人类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也反映了早期人类生存对自然的依附。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有了自然神观念和自然崇拜，有了形形色色的原始巫术和鬼神信仰。这些传统的自然鬼神观念和古代的宗教思想，成了后来道教创立时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因而也使道教具有了浓郁的神话色彩。

1. 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所谓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就是对大自然神灵和对本民族死去先人的信仰。据考古发现，中国人的祖先最早产生宗教意识大约是在公元前10万年至公元前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19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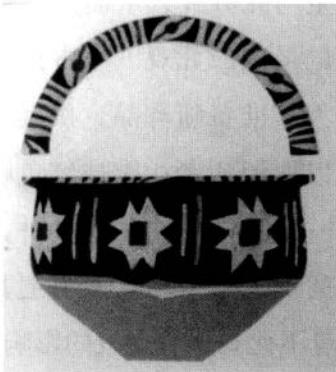
考古学家们在曾发现著名的“北京猿人”头骨的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穴内发现了“山顶洞人”遗址，他们发现山顶洞人在埋葬尸骨时，头颅均朝向一个方向，尸骨旁还放有石制的纺轮、箭簇等较精致的陪葬物，同时撒了一些只有几百里路以外才有的赤铁矿粉。裴文中在《中国石器时代》一书中说道：“山顶洞人还用赤铁矿做红色染料，将装饰品染成红色。尸体旁边的土石上，也撒上赤铁矿粉末，染成红色。”^①贾兰坡指出：“在人骨的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是墓葬可靠的标志。”考古学家们指出的山顶洞人对赤铁矿粉的两个用途，可能都带有信仰的目的。其一，用赤铁矿粉为染料，把石珠、带孔的牙齿、边缘钻孔的鲩鱼眼上骨染成红色，置于尸体旁边作为陪葬品，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审美，吸引异性，同时也借此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某种态度、感情和愿望；其二，在人骨四周撒上赤铁矿粉，把尸体旁边的土石染上红色，一方面，有驱除野兽的作用，即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红色的物质，可能被认为是血的象征，人死血枯，加上同色的物质，希望他（或她）们到另外的世界得到永生。这说明在山顶洞人的头脑里已开始有了人死后将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的简单观念。

灵魂信仰并非与生俱来，它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的元谋人和北京人时代，人死，弃尸于野，被鸟兽分食，其处理死人的方式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不具备灵魂信仰产生的条件。到了山顶洞人时代，山顶洞的四分结构，活人、死人、动物分开，表明人类有了两个世界的观念。对外界来说，人已经懂得把人与自然界分开，把人与动物分开；对人类自身来说，把

^① 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第35页。

活人与死人分开，把生与死分开，从而产生了人死后到另外世界生活的灵肉可以分离的灵肉二元观。考古遗存所见把死人的躯体安置于专门的地方，为其准备随葬品，供其在另一世界使用；在尸体旁放置装饰品，以取悦死者；撒抹红色赭石粉，以求死者的血液畅通，生命在另一世界延续，凡此种种，正是原始灵魂观的一种表现。灵魂不死的观念是一切宗教普遍具有的特征，而中国古代鬼神观念中的灵魂不死观念对道教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大量的考古发掘和遗存至今的中国古籍记载表明，自然崇拜的产生同中国古代的居民较早从事农业生产、摆脱自然的束缚有直接的关系。农业生产收成的好坏与丰歉，在当时生产技术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完全依赖于自然存在以及变化条件的优劣。先民们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各种自然现象由各种神通广大的神灵所掌握，大自然一切现象的生灭变化都是由神灵掌握的。如果丰收了，是大自然神灵对人的恩赐；如果歉收，那就是大自然神灵对人的惩罚。由于四季运行及天气变化的好坏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它高深莫测，并统揽了整个宇宙。由于太阳给人带来温暖、光明，影响着白天与黑夜的更替，关系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同时，太阳能使万物生长发育，给人类带来丰富的食物，因此，人类早期各个民族的先民都特别崇拜太阳神。后来慢慢地演变为对一切认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其他自然现象，如土地、月亮星辰、风雷雨电、山河湖海、草木鸟兽等，也都加以崇拜。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几个考古遗址——山东省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甘肃省临洮马家窑文化遗址等地已发掘出土的器物上，都雕刻着表示对天体日月星辰崇拜的图形。



江苏邳县大墩子 1966 年出土大汶口文化中期
八角星纹彩陶钵，距今 5000 多年前

祖先崇拜对于中国古代先民极为重要，相传古代中国的人们由于无法抵御水灾等自然灾害，只能联合起来，在杰出的英雄人物领导下抗御灾害，因此，祖先中杰出的英雄人物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就形成了对祖先中英雄人物的崇拜。并希望能够在任何困难面前，都得到他们的庇佑，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三皇五帝，就是这样的人物。后来，又将这种对祖先中杰出人物的崇拜，扩大到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切具有杰出才能，对人类有过杰出贡献，以及个人品德优秀的人物，如帝王、大臣、将军、医生、慈善家等。由此，也造成了中国自古以来把对长辈是否遵从和尊敬看成是做人的一项首要品德，提倡“以孝为先”，极为注重“孝道”。同时，特别重视死人的埋葬，形成了用大量财物对死者进行厚葬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

到了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殷商时代，人们已经从原始的图腾和自然崇拜发展到以“上帝”和祖先鬼神为中心的“敬天祀祖”。人们把认为能代表“天”的意旨、具有至高无上

权威的神灵，称之为“神”；对宗族祖先或对本族有功而死去的鬼魂，称之为“鬼”；把专门从事与鬼神沟通的人，称之为“巫祝”。大量发掘出土的甲骨文说明，当时人们无论在进行征战、祭祀、狩猎和耕作等重大活动之前，以及预测一年收成丰歉、生男生女、凶吉祸福、天气旱涝、用人畜的多寡等，都要在龟甲兽骨上占卜，请命于上天。通过鬼神对先民的某种神秘的暗示，引导先民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可见对自然的崇拜之盛行。

取代殷商王朝的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1世纪），继续沿袭了殷商时代对鬼神的崇拜，神权与王权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王不仅要听命于“天”，并进一步认为国王就是“天神之子”，是代表“天神”的意志来统治和管理世间的。而且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祭祀“鬼神”的制度，规定只有天子（即国王）才可以“遍祭群神”，各地诸侯可以“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一般百姓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古籍中，关于颂扬天神、祭祀鬼神的各种制度以及认为由于人冒犯了鬼神而受到疾病或灾难的惩罚的记载，相当地普遍。如《尚书》的“尧典”、《礼记》的“祭义”、《周礼》的“大宗伯”等。此外，道教在创建道教组织的过程中，又吸收了当时许多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祖先的崇拜和对自然神的崇拜，以及崇拜仪式。据中国河南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道教手册》称，道教崇拜的神灵就其来源，可归为八类。这八类是：①由中国古代各民族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演化而成的神灵；②由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和后来历代圣贤英雄演变而成的神灵；③中国社会大一统形成初期（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形成的对五岳（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五座山）、四渎（长江、黄河、淮河、古

代流经河南省和山东省的济水四条河)之神灵的崇拜;④中国社会大一统中期(约公元5—9世纪时)盛行的对天、地、四方(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城隍、土地之神灵的崇拜;⑤中国社会大一统后期代表大一统思想逐步形成的对“三清”(道教至高无上的三位最高天神)、“四御”(道教中统治天界的三位天帝和一位天后)的崇拜;⑥从佛教中吸收过来的神灵,如慈航道人、普贤道人等;⑦各民族、各地区原来的地方神、民俗神和行业神;⑧道教创立后,历代各派祖师、修炼而成的仙人,著名的修道隐逸之士。由此可见,虽然道教所崇拜的神灵有源自上古时代的自然神和祖先,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增加。

2. 宗天神学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道教产生时的300余年间,秦汉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力借用宗教神学来为自己的统治作论证,如秦始皇“以为周得火德”,而秦代周则应为“水德”,于是下令衣服、旌旗、节旗等“皆尚黑”(水配黑色),以此来迎合“五德终始”之说,又东巡封禅、祭祀泰山之神及齐鲁地区的“八神”;汉武帝则试图借鉴历史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的经验,“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设立祭坛以祀鬼神,他曾在长安东南郊设立“泰一祠坛”,又设“五帝坛”环居其下以求能得神灵佑护;汉哀帝时神祠已达700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秦汉统治者对鬼神的崇信,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为宗教神学的孳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维护皇权的需要,董仲舒的宗天神学也应运而生。他援引阴阳五行说,重新解读儒家经典,建

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是“百神之大君”，认为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是由这个大君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当帝王的行为体现了天意，积善行德，天就降福瑞任命他、嘉奖他，当帝王违背了天的意志，有了过失，天就降灾异警告他，让他改过。如果屡教不改，就要受到天的惩罚。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善恶报应”思想的表现，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宗天神学，纵贯于昭、宣、元、成、哀、平各代，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以阴阳五行说附会儒家经义，而且还创造求雨、止雨仪式，登坛祈祷做法，集儒生、巫师、方士于一身，他将儒学加以宗教化，促使儒生与方士合流。天人感应论和善恶报应说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为社会出现新宗教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

此外，灵魂不死的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很流行，如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画即绘有人死后灵魂所去的“天堂”及“黄泉”。

3. 訒纬神学

谶纬之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谶是一种假托神意制造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

政治语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源于巫师和方士，由来已久。“纬”是以神意来对儒家经典所做的解释。把儒家六经宗教化，把孔子神化为超人的教主，合称谶纬之学。由董仲舒开始的儒学宗教化，在汉王朝统治者的提倡支持下，日益发展，以致托神意制造政治预言的谶语和以神意解释儒家经典的纬书所表现的谶纬神学空前活跃起来。

其实早在反秦斗争中，人们就不断利用谶语的形式，作为政治斗争的精神武器。秦始皇三十二年，被派入海求仙的燕国人卢生回来了，他给秦始皇献上了《录图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据说这个“胡”字是指胡亥，可是秦始皇误解为是胡人，就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去攻打北方的胡人，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土地。这儿所说的《录图书》，据《资治通鉴·秦纪》胡三省的注就是后世所谓的谶纬之书。陈胜与吴广谋起事时，受卜者“卜之鬼”的启发，丹书鱼腹，丛祠狐鸣，制造了“大楚兴，陈胜王”的谶语，借鬼神以“威众”。汉高祖刘邦起义则有斩白蛇的故事。传说，公元前212年，时任泗水亭长的刘邦奉命押送一批刑徒从沛县前往骊山参加修筑始皇陵。但出发不久，自知到了骊山必定有去无回的刑徒们就开始纷纷逃跑。刘邦发现之后大为恐慌。他估计，照这样下去，到不了骊山，刑徒们就都会跑光，自己犯了失职大罪，也会免不了一死。刘邦想与其是死，还不如索性成全大家。于是，当队伍到达丰西泽中时，刘邦喝了些酒，然后松开了刑徒们身上的绳子，让他们自己逃命去。但有十几个人不愿意丢下刘邦一个人走，都表示愿意跟着他。刘邦接受了他们，当晚刘邦一行十多人在泽中小道逃跑。突然，一条大蟒蛇挡住了前面的逃路。同伴们见到大蛇，吓得要往回走。刘邦知道，往回走一定会被官

府追兵杀死，此时已经没有退路。他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勇气，一声大喝：“壮士行，何畏！”说完拔出三尺青铜宝剑，毫无畏惧地走上前去，将挡道大蛇斩为两段。然后带领同伴们继续前进。传说，一会儿后边的人赶了上来，对他说在路旁看见一个老太太哭，问她原因，她说有人把他的儿子杀了。又问为什么被杀，她说他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化成一条蛇，在此挡道，如今被赤帝的儿子斩杀。众人以为老太太在造谣惑众，威胁说要打她，老太太却忽然消失不见了。刘邦从此知道自己是真龙天子，更加自负。而追随的众人听了此事之后，也更是对刘邦敬畏有加，甚至崇拜起来。刘邦当了皇帝，为了在其宝座上涂上神圣的光辉，御用文人为他编造的神话更多，纬书甚至说在孔子时就知道刘季（即刘邦）要当皇帝。

整个汉代，谶纬都很盛行。王莽篡汉称帝，也大造符谶作舆论，所谓丹书著石“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就是露骨的一例。汉光武帝刘秀更是靠图谶登上帝座，所以更加崇信谶纬，到他临死的前三个月，即中元元年（公元3年）十一月“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法定化，促进了神学思潮的泛滥。谶纬所反映的神学思想是多方面的，卿希泰先生在《中国道教史》一书中据有关资料将其分为八类：第一，有关“天人感应”思想；第二，有关星占吉凶；第三，关于司过之神与三尸；第四，有关巫术去鬼；第五，关于呼神（五岳神、四海河神、五官神）防病、却鬼术；第六，关于昆仑山与西王母；第七，关于黄帝的神话；第八，对孔子的神化。

由此可以看出谶纬神学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天人相互感应，星象预示吉凶；人的寿命来自“天赐”，为善作恶影响寿夭；巫术可以驱鬼，呼神亦能却鬼；昆仑山是圣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